

首先需要申明，因為漢語自身特點的緣故，本文標題容易產生誤讀，可能會讀成「捆書記」，這是本人絕對不敢做的小事。本文標題正確的讀法應該是：捆書。說到捆書，總不如捆書聽起來雅致。事實也確實如此。我們常見將書裝箱托運，捆這個動作，聽起來總覺得與其對象——書——之間，不大協調。書是買來讀的，可以上架，可以吟嘯，要拿來捆，有點斯文，情何以堪！因為奔波謀生，少不了要將一點藏書集合起來托運。如何集合，只有捆——用從商店裡買來的綵帶捆繫，書下面墊上舊報紙，上面也蓋上舊報紙，然後打捆——窮人家的書，也只能享受如此待遇。

我曾經有兩次居家搬遷的經歷。一次是十年前，從江城武漢遷居杭州，再一次就是正在進行的從杭州遷往上海。十年前的搬遷，因為我自己不在家，所有遷居後事，皆由她在家打理，所以其中辛苦，我只聽說，沒體會。據說專門找了幾位班上學生周末幫忙，這幾次搬遷，後來竟然還因為捆書專員的因緣，有從江城一路追隨到杭州讀書者，實在不知道是書的魅力還是其他。後來聽說離開武漢那個巴掌大的家室的時候，幾隻大箱子裡面，除了必要的換季衣服，就只剩下書了，而且又是以我的書為主。

因為前一次搬家我沒有出力——只是在幾千里之外遙控指揮，於是此次搬遷，我就成了總指揮兼總努力了。她交代，衣服傢伙不用我費心，但我的幾千冊書，她和閨女也不會動手，完全交給我一人承辦。

其實，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難處，再說也很想利用這樣一個清書捆書的機會，將有些買回來幾乎還沒有來得及翻看的書再讀讀。於是，我是一邊從書架上「下」書捆書，另一邊又是在床邊不斷堆書——堆的都是自己覺得沒有好好讀過或者覺得還需要再讀的書。就這樣，書架上的書確實一點點捆起來了，但床邊堆起來要讀的書也多起來了。有時候，乾脆停工讀書。這時她就會在一邊催工：你這樣捆書，要捆到猴年馬月？還去如請個幫工來一下子捆好算了！

我怎麼會同意請一個幫工來給我捆書呢？書拿來捆，已經覺得不敬了，再找個全然沒有一點敬畏愛惜之心的幫工來捆，拿是對待書的正確態度和方式嗎？

於是，幾千冊書，我從十一月份開始清理打包，一直到十二月底，還沒有完全清理捆完。有時候，碰到一兩本當初興奮不已買回來卻沒有來得及看的書，現在一下子又翻出來，那種就眼見到老朋友一樣的感受，實在溫暖得很。有時翻翻出來的舊書，恰恰是現在自己正在思考的某個問題相關的文獻，或者覺得自己當初在哪份文獻中讀到過某種議論闡述，但現在一時就是想不起來，因為你不可能有錢鐘書那樣的記憶力，再見到這份文獻著述的時候，那種豁然開朗的思想通暢感，也實在是這讀書生活中值得炫耀的經驗。書一捆捆捆好了，整齊地堆放在房間牆壁邊，還有原來的書架上，等待著裝運到新人的房間、新的書架上。書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搬遷史，也不知道它是在富人家還是窮人家，是在華貴的書架上，還是在寒酸得拿塊塊木板裝訂成的簡易書架上。這些對書都無關緊要，其實書什麼也不知道，知道這些的是書的主人。我還是覺得，將買來讀的書拿來捆不是一件好事。於是也就跟自己立了一個約定：爲了善待自己的藏書，以後要少搬家，盡量不再搬家。不爲別的，就只爲了這些書不再折騰搬遷了。好麼？

記者爲何流淚？

周雲龍



記者，有文字記者、攝影記者，還有攝像記者。記者，有報社記者、雜誌社記者、電台記者、電視台記者，還有網站記者。

不過，記者與記者，似乎還有一種區別，有的是爲生存而打拚，有的是爲責任而較量，有的則是爲理想而奔波。

所謂生存型記者，他們把寫稿子、拍片子作爲謀生的手段，他們更關注發稿量、收視率，更關注工資、獎金，而不是稿件的深度，畫面的張力。等而下之的則是，借記者的名頭，借監督的由頭，鑽空子，撈好處，辦私事，這是什麼類型的記者？一時還找不出合適的詞語界定他們。而責任型記者、理想型記者，在他們筆頭、鏡頭下展示的是傳媒職業的責任、新聞行業的理想，不是蒼白的文字、冰冷的畫面，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始終是有溫度的。清華大學教授尹鴻鈞參加過央視《新聞調查》的一次活動，本應是賀歲的喜慶氣氛，但活動舉行到一半，一堆年輕記者聚在一起抱頭痛哭，原因只有一個——自己做的調查節目沒能播出，自己想要表達的那件事情沒有被表達出來，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爲社會盡到責任。尹鴻鈞說，記者需要一種熱情，這種熱情來源於對公共事業的熱愛，他們內心樂意或者願意爲社會公共事業做貢獻。

在年終賀歲的場合，我們會流淚嗎？記者有淚不輕彈，只是未遇傷心事；也許，我們會因爲個人收入不高，無法及時還清房貸、車貸而尷尬流淚；會因爲個人待遇不公，部聘沒有轉爲台聘，科級沒有升爲處級而傷心流淚；會因爲同事的誤解，領導的批評而委屈流淚……什麼時候我們是因爲公民的責任、新聞人的理想而有過流淚的衝動？當然，記者不是必須流淚的職業，但是人們更不希望看到他們面對利益、物質、實惠慾望時的那份喜喜！

網上有個段子，不成熟男人的標誌是可以爲了理想壯烈地犧牲，成熟男人的標誌是可以爲了理想卑賤地活著。——但願那些熱衷於「會裡泡」、「拿紅包」、「拉廣告」、「炒股票」的記者，看上去有些卑賤、猥瑣，而他們不過是在爲實現自己的新聞理想，爲營造寬鬆、自由、民主的輿論環境，做着一種曲線的努力。

她強烈要求同住。父親不許，她就躺在臥室裡絕食，父親只好同意了。之所以同意她出國，也因她幼時家人爲她訂下一門「娃娃親」，其未婚夫此時正在比利時留學。

到了布魯塞爾，錢秀玲見到未婚夫後卻開門見山提出解除婚約，她：「我們從未見過面，彼此都不了解，還是各自選擇自己的生活吧！」不久錢秀玲以優異成績考取著名的魯汶大學化學系，成爲該系唯一一名中國女性。一九三五年，二十二歲的錢秀玲獲得魯汶大學化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在這裡她認識了白俄羅斯青年白蘭芝，高雅英俊的白蘭芝令錢一見鍾情，而錢的聰慧博學和東方氣質也讓白蘭芝相見恨晚，兩人於一九三五年十月走進羅滿玫瑰花花的「洞房」。從此他倆相濡以沫，攜手度過六十多個漫長歲月，這株愛情之樹始終歷久彌新。

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佔領比利時。錢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鎮有位愛國青年羅傑用地雷炸毀德軍列車通過的鐵路。事情敗露後羅傑被捕、面臨絞刑。錢秀玲聞訊後崇敬、驚恐與無奈並存，無意中見到報紙上一個熟悉的名字「馮·法爾根豪森」，她不由點燃一絲希望。原來，這位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區最高長官馮·法爾根豪森將軍，多年前曾在中國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與錢秀玲的堂兄錢卓倫互相賞識，並結爲莫逆之交。錢秀玲赴比利時留學時堂兄曾對她說，一旦遇上難事可以找法幫忙。錢卓倫還來信告訴錢秀玲：法爾根豪森與其他德國軍人不同，他爲人正直、有正義感，對中國感情很深。

在丈夫白蘭芝鼓勵下，救人心切的錢秀玲連夜趕赴一百六十公里外的布魯塞爾求見法爾根豪森。她呈上錢卓倫的來信和艾海德姆鎮居民的聯名求情信向將軍求救，錢秀玲的精神讓這位德軍將領很感動，他猶豫了一下說「讓我試試吧！」沒想到，在法爾根豪森的努力下，羅傑的死刑竟被改成苦役，另一名死刑犯也獲救了。錢秀玲的事跡不脛而走，她成了比利時人民心中的女英雄。

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即盟軍諾曼底登陸後的第三天，艾海德姆鎮附近的艾克與市反法西斯組織擊斃了三名蓋世太保軍官。德軍立即逮捕了九十六名青壯男子，並宣布三十六小時內不交出兇手，將全部槍斃這些人質。悲憤絕望的人們再次找到錢秀玲，錢秀玲拖着五個多月的身孕與丈夫一起再次趕往布魯塞爾向法爾根豪森將軍求救，九十六名人質果然全部獲救。不久，法爾根豪森將軍被蓋世太保秘密逮捕。二戰結束後，艾爾伯蒙市政府舉行隆重的表彰大會，比利時政府授予錢秀玲國家英雄勳章，並將一條街命名爲「錢秀玲路」。

一九四八年，法爾根豪森以比利時頭號戰犯身份押回布魯塞爾接受審判。錢秀玲聞訊後立刻到監獄探望他。她與丈夫白蘭芝一起，不畏輿論壓力爲這名德軍將領奔走呼號。她說：「如果我在二戰期間爲比利時人做了一點事情，得到政府授予的國家勳章，這一切都離不開法爾根豪森將軍的幫助，是他冒着生命危險努力的結果，沒有他的幫助我將一事無成！」一九五一年三月，在監獄度過七個春秋的法爾根豪森終於迎來自由，他還在錢秀玲的撮合下，與一位苦戀他的反戰女英雄喜結良緣。

二〇〇六年，白蘭芝在比利時去世，痛苦欲絕的錢秀玲一下蒼老了许多。每當想起白蘭芝她的眼裡就飽含愛戀與傷感。兩年後，奇女子錢秀玲以九十五歲高齡謝世，臨終前她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點應該做的事情。」

花香瀟灑的日子

若 荷

很不甘心冬天的單調，便向同事要了一盆花擺在案頭。花的名字叫星星草，是花卉中極普通極平凡的一種，花盆極小，花株也極小，細細的葉莖似撐不起葉的重量，倒伏着。只是花生長得很快，從綴茁到生長，僅一月有餘，便從母株一側側生出幾枚嫩綠的幼芽，繼而又抽出三五枝花蕾。不久，幼

芽長成，葉片漸密，如此細細品味，不覺深受啓迪和感動。星星草，儘管它如此的單薄微小，如此的平凡和不出色，皆爲是無論在什麼樣的土壤裡，什麼樣的環境下，都可以堅強樂觀地繁衍生長，所以人們才叫它星星草；之所以與衆不同，那就是它與陽光的那份摯愛和追求，正是因爲這樣，它才由「星星草」脫穎爲「太陽花」。雖然它不名貴，但它卻有堅強的生命力，掣動的向心力，氣質安然，美麗而淡雅。正如我所敬愛的那樣一些人們，默默地揹負着歲月的沉重，卻用勞動和汗水抒寫着豐碩的秋歌，心態寧靜淡泊，精神質樸純正，生命的永恆就是在這樣的全部的渴望和希冀中閃現着光華。

星星凋謝的時候，通常是翌年的春天，天氣乍暖還寒，我將花搬出室外，我知道，不久這花再經風雨會重新煥發出生命的綠色。無花的窗台空蕩起來，明麗的陽光正照射我的書桌，渾然天成的光明與暖意正如溫軟的柔紗圍裹着我，又如春天的胸膛擁抱着我，不由從心底升起一縷欣慰，一份感激。於此，我理解了星星草那樸素的美麗和真實的滿足。窗外正演繹着另一個季節：春天。

民國時期的跨國婚姻

馬承鈞

國的蔣經國臥病時，她也趕來精心侍奉，兩顆年輕的心終於擦出愛情火花。有情萬里來相會，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歲的蔣經國與十八歲的芬娜走進婚殿堂室。

後來蔣經國被蘇聯當局懷疑爲美國間諜，一度將他拘留，憂心忡忡的芬娜只好通過關係向遠在中國的未謀面的公公蔣介石求救，在老蔣的一番外交斡旋下，一九三六年底蔣經國終於獲准返回祖國。蔣經國帶着改名爲「蔣方良」的蘇聯妻子到杭州拜見父親蔣介石和宋美齡，並在奉化溪口老家舉行了第二次婚禮。蔣方良與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住在一起，相處很好，還向老人家學習寧波話。蔣方良爲人低調，像一個傳統的中國婦女，即使後來丈夫當上「總統」，貴爲「第一夫人」的她仍很少亮相。遺憾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來到中國的蔣方良從此再也未能回到她的祖國。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九十高齡的蔣方良在台北溘然長逝。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界，周作人是最富悲劇性的人物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到中華民族的罪人、從提倡「人的文學」到鼓吹漢奸文化，其大起大落令人嘆息。提起他的跨國婚姻，也是見仁見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叫羽太信子，但他與羽太信子的相識、相戀與結合的內幕，他本人極少提及，所以鮮爲人知。周作人有寫日記的習慣，偏偏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這六年間沒有日記——而他與羽太信子正是一九〇九年在東京結婚的。

當年周作人是與兄長魯迅一起留學日本的，得知周作人將要與羽太信子結婚的消息後，魯迅和他們的母親魯瑞默默應允了。魯瑞是位通情達理的慈母，她理解魯迅和宋安婚姻的不幸，並爲之苦惱和自疚，所以對周作人、周建人的婚事就放手不管了。她說，周作人與羽太信子的婚事，雖然親友們來說紛紛，但只要兒子喜歡，她就安心了。誰能想到：正是因爲羽太信子的原因，導致日後魯迅與周作人這對中國文壇的兩位名人兄弟鬩牆、終生視同陌路！

周作人伉儷性格迥然，一個內斂而儒雅、一個張揚而粗俗，卻能相安無事，其中的風雨同舟恩怨雜陳，恐怕只有他倆知曉。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羽太信子病重，年近八旬的周作人求中國文聯工作人員將她送到北大醫院搶救。年邁體弱的周作人當晚在日記中云：「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年餘的情感尚未爲惡習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誌感。」讀此文字，不無悲涼之感。過了一天，七十五歲的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醫院去世，一段橫跨五十四載的「跨國情」終於落幕。

前幾年，內地一部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人》轟動一時，創收視率新高，該片的主人公原型是一代奇女子——錢秀玲。錢秀玲出身江蘇宜興一家庭門望族，她從小聰慧過人，十一歲考入蘇州女子師範附中，後跳到上海大同大學預科，攻讀化學，一心想當中國的「居里夫人」。一九二九年春，其兄錢卓儒要去比利時留學，

都說「文化無國界」，其實愛情與婚姻也「無國界」。隨着對外開放的深入，如今跨國戀和涉外婚姻在中國大陸司空見慣，人們不再用近乎「異類」的目光來審視他們了。其實，早在民國時期涉外婚姻就存在了，有些還成爲國人津津樂道的典範呢。

說起民國時期跨國婚姻，首先想起鼎鼎大名的蔣經國與他的蘇聯妻子。一九二五年，蘇聯爲迎合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首批赴俄三百名優秀青年中，就有蔣介石十五歲的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化名「尼古拉·伊利科洛夫」，他學習刻苦、爲人正直，頗受大家歡迎。蔣經國還結識了在此短暫停留的鄧小平，他很喜歡晚飯後跟隨鄧小平等人到學校附近的廣場、公園或莫斯科河畔散步，尤愛聽鄧小平講述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帶有傳奇色彩的驚心動魄的革命鬥爭故事。

畢業後，蔣經國被分配到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後升爲副廠長。一次偶然的機會讓蔣經國扮演了一回「英雄救美」，因此結識了剛從技術學校畢業的十七歲女工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天生麗質的芬娜是白俄羅斯人，父母爲沙俄貴族，被當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關進勞改營。在廠裡芬娜受到蔣經國悉心關照，自然心存感激；獨在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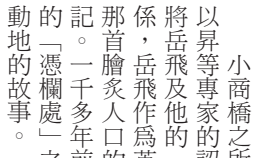
蔣經國、蔣方良夫婦（資料圖片）

，酸甜爽脆，生津開胃。砂鍋燉蘿蔔羊肉，溫陽暖胃，滋補祛寒。土豆飽含澱粉，可當主食可作菜，用它燒牛肉，曾被一位外國首腦譽爲頂級名餚。吃了熱的上涼的，白菜、蘿蔔製作的泡菜酸菜也不差，白中透綠，綠中帶紅，清脆酸辣，外涼內火，能吃出一頭熱汗，不亞於冬天裡的一把火！

「老三樣」是應時蔬菜，自然生長，塑料大棚決不會栽培。它們貌不顯麗，樸實無華，最便宜的年代才幾分錢一斤，現今產地的售價也不過每斤幾角，卻是營養豐富，含有多種維生素、蛋白質、氨基酸等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有的還被稱爲「賽人參」，是物美價廉的有機食品。吃了一冬又一冬，養育了一代又一代，對於中華民族尤其是北方地區的百姓來說，「老三樣」普渡衆生，不至於在寒夜餓死凍死，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吉祥三寶」，所以，人們對「老三樣」常懷感

河南小商橋溯古

許 揚



金人南下，岳飛與金兵在進行激戰，宋公理處進行激勵，宋將楊再興與岳飛大破拐子馬，金兵大敗。幾天之後，金兵的首領兀朮又率兵十二萬，以小商橋爲前陣，和宋軍對壘決一死戰。岳飛爲了乘勝追擊，派楊再興率三百輕騎爲先鋒，楊與金兵激戰於交鋒。楊毅敵心切欲越河北上，然當時天降大雨，河水上漲，其坐騎被河中的淤泥、蒿草纏住，陷入河中，金兵萬箭齊發，楊將軍中箭而亡。時年三十六歲。楊雖身中數箭，但仍然怒目圓睜，面向北方而不倒，這便是著名的「郾城大戰」。岳飛看到此景，並用痛哭，將楊再興葬於身放的地方，並用

有故事的石灰

流 沙



傾一時，曾任兵部左侍郎。「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時，他又堅決反對遷都南京，擁立景帝，調集各路軍馬嚴守京師，升兵部尚書。一個長在西湖邊，喝着錢塘水的杭州男人，成爲升帳行軍打仗的首領。

于謙的成名，與石灰有着莫大的關係。如果沒有他的《石灰吟》，現在于謙會不會躍然於明朝的故紙堆中，這很難說了。

「千鍾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據說這首詩是于謙十六歲時候寫下的，具有白居易那樣的淺白，表達了詩人的氣度和追求，非常傳神和到位。

于謙與石灰結緣，這與杭州的地下所藏有關。杭州屬於丘陵地貌，地下岩石多爲石灰石，如果開採出來用作建材，就是大理石。我老家就在浙北山區，山上全是石灰石。我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批來自杭州的城裡人在村外開礦，開採出來的石灰石紋理非常漂亮，顏色是墨黑的，中間又有縱橫交錯的白色或者紅色的紋路，據說這些大理石運到杭州進行加工後，是送往北京的。開礦會產生大量廢石，這些廢石就是上好的燒製石灰的原材料。燒石灰在杭州一帶，自古以來非常盛行。而我所在富陽，因爲毗鄰杭州，其出產的石灰口碑極好。在富陽民間，石灰窯到處都是，石灰礦也遍布全境。

史料載，于謙寫下《石灰吟》，就是看了富陽的石灰窯有感而發而寫下的。也就是說，這首千古流芳的詩文中的石灰，寫的其實是富陽的石灰。

我查閱了不少資料，想考證一下于謙當年是在富陽哪個地方看了石灰窯，目前仍無結果。但這次考證讓我有另外一個意外的收穫。晚清至民國年間，我祖上在富春江支流邊一個叫沒淥渚的地方辦了一家石灰石礦，同時燒製石灰。燒好的石灰通過船隻，從支流運到富春江，然後從富春江運到杭州、上海。我曾祖父當年就經常住在上海，打理石灰生意。大家知道蔣介石是浙江人，老家在寧波奉化溪口，他的父親蔣肇聰也做石灰生意，而蔣肇聰所銷售的石灰就是從富陽進貨的。而從富陽進石灰，按照當年的交通狀況，必須走水路。而在水路邊，我曾祖父的那個石灰石礦是最大的一個。也就是說，蔣的父親從富陽進石灰，極有可能是我祖上的石灰石礦中進的。但這只是猜測，現在無法考證了。

再來說于謙，當年淥渚水上交通發達，是一個商埠。少年于謙是不是乘船到過淥渚，看過那裡發達的石灰燒製場面？

這同樣也是猜測。而正因爲有了這些似有聯繫，但又無法確認的糾結狀態，讓人產生了一種探究的慾望。現在，我再去讀《石灰吟》，就覺得非常親切。現在，那些爲了綠化而大量關停的石灰窯，早已湮滅茂盛的雜樹當中，它們曾經發生過故事，但它們的故事，就像它們的狀態一樣，鮮有人知了。

「老三樣」

霍 無 非

假如不是去年北方的寒流和大雪來得特早，假如不是雪埋菜地，壓塌菜棚，阻塞交通，菜價飄升，各地用「老三樣」來應急救市，我或許已淡忘了它們。 「老三樣」即白菜、蘿蔔和土豆，是多年前北方過冬的當家菜。柿樹掛紅的深秋，黃葉落了，樹下的菜地也白花一片，農家收穫了地裡的秋菜，碼齊裝車，運到城裡去賣，那水嫩瓷實的是大白菜，青白各半的是脆蘿蔔，最活潑的是黃澄澄的圓土豆，一開包咕嚕嚕滾到腳邊，攏都不好攏。此時城裡鄉下，修窗訂菜是件大事，車拉筐抬是街頭一景，貯備充足了，全家過個好冬好年。

「老三樣」可熱炒，可醃製，吃法很多；醋熘大白菜，是將白菜幫子切成斜片放入陳醋爆炒